

失樂園與回返的路徑上： 論孫維民詩的都市與自我

劉佳蓉¹

摘要：本文旨在論述孫維民詩的宗教元素，如何介入其都市體驗，造成 1980 年代以來臺灣都市詩的書寫新變。做為基督教詩人，孫維民身處價值信仰失落的後現代都市似頗有違和，卻也因此成為風格突破的契機。本文由「都市空間樣態」和「自我安頓問題」兩個層面切入，發現透過大量收納宗教元素，孫維民詩中的都市空間展現出善惡、救贖與絕望、神魔等概念的拉鋸，既是對文明的反思，也是對自我信仰的反覆試探。不同於以往都市詩的書寫模式，將文明與宗教置於二元對峙之境，突出文明壓倒性的勝利。孫詩中游移善思的主體，更著意試驗安頓的可能與不可能。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的風格轉變，孫維民鋪展出都市空間與宗教意象相互隱喻、轉型，從而創生出新詩意的軌跡。

關鍵詞：孫維民、基督教、都市詩、自我

¹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Paradise Lost and the Path of Return: A Case Study Cities and Self in Sun Weimin's Poems

Liu, Chia-jung²

Abstract: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religious elements in Sun Weimin's poems and analyzes how they fuse with urban experiences, transforming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city poems since 1980s. As a Christian poet, Sun's writing style seems to be out of place in postmodern cities of lost values and beliefs, yet in a way helping him make breakthroughs on styles. The thesis discusses Sun's poems from two aspects: the urban space and self-exploration. It suggests that the urban space in Sun's poem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ruggle among good and evil, redemption and despair, deities and demons, for his works teem with multiple religious elements. This shows Sun's reflection to the civilization and repetitive exploration to his belief. Varying from the previous writing pattern of city poems which put a dichotomy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 and the religion, the civilization obviously has a landslide victory over the other in Sun's city poems. The wander and self-exploration of Sun's poems also try to challenge whether one can reach peace in oneself.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yle in Sun's *The Tower of Babel* and *On the Earth's Surface*, Sun has made mixed metaphors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religious images, creating the new path of poems.

Keywords: Sun Weimin, Christianity, city poems, self

²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一、前言

孫維民自 1980 年代起，於各報刊發表詩作，以冷肅的語言及詩風見長。1980 年代臺灣都市結構逐漸發展成熟，嶄新的都會現代性孵育新生代都市詩的發展。陳大為曾梳理 1930 年代以來臺灣都市詩的發展脈絡，並分為五個階段，孫維民則未被納入其論述譜系。³ 相較於同期的陳克華與林耀德，孫維民顯然不如陳、林二人如此大規模且有意識地以「都市」為操作對象，著力探索都市詩發展的可能性。究其詩而言，「都市」更加不著痕跡且理所當然地淡化為背景，做為一種現代的日常生活空間。

再者，孫維民做為一位基督教詩人，在「上帝已死」、神的形象崩解的後現代都市徘徊遊走，似不無衝突之處。基督教信仰思維的滲透，標誌其詩特異之處。但歷來對於孫維民詩的研究甚少，多散見於報刊的書評短論，僅陳政彥曾以專文探討孫維民詩中「惡」的意義。⁴ 劉正忠曾於〈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一文，探討孫維民詩的污物意象，⁵ 是少數從基督宗教思維的角度，分析孫維民詩的論著。黃家展《孫維民詩的主題》承此脈絡，以一章的篇幅深入探討孫詩「惡」的書寫模式，並嘗試歸因於孫維民的

3 陳大為：〈對峙與消融：臺灣都市詩的發展歷程〉，陳大為、鍾怡雯編：《20 世紀臺灣文學專題 II：創作類型與主題》（臺北：萬卷樓圖書，2006 年），頁 73-117。

4 陳政彥：〈惡的象徵：孫維民詩研究〉，《臺灣詩學學刊》，第 18 號（2011 年 12 月），頁 31-52。

5 劉正忠：〈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9 期（2008 年 11 月），頁 149-183。

基督教思想。⁶

本文在前人的論述基礎上，擬以孫維民詩的都市空間為切入視角，透過孫詩「都市空間樣態」及「自我的安頓問題」兩層面切入，試圖探討孫維民的基督教思維，如何與其都會體驗發生碰撞，進而使其詩的都市空間呈現不同面貌。換言之，基督信仰與後現代都市，究竟如何在孫維民詩中產生複雜的互動關係，兩者是否有超越或調和的可能，即為本文的關注焦點。

二、失樂園的再現：神魔共存的都市空間

十八世紀西方進入工業時代，科學、工業文明取代傳統宗教的神，新興都市應運而生，長期主導西方社會的基督教道德觀逐漸崩落。1882 年尼采於《歡悅的智慧》（又名《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如是說》二書，先後宣告「上帝已死」，⁷ 不僅反傳統基督教信仰，更昭示虛無主義和文明社會新「神」的降臨。其實在孫維民以前的 1950、1960 年代，羅門就已經敏銳地注意到宗教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只是，不同於尼采的進取觀主張超越，⁸ 羅門更近於

6 黃家展：《孫維民詩的主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頁 109-152。

7 海德格認為尼采「上帝已死」之說，代表柏拉圖主義、以基督教為主導的歐洲形上學的終結。尼采藉由「上帝之死」，提出以基督教上帝為中心的傳統宇宙觀，已無法成為人類道德標準的最高價值，反對絕對的道德觀。基於絕對價值的喪失和取消，尼采進一步宣示虛無主義的到來，試圖從中尋找重估人類價值的方法。

8 尼采的進取觀，當以「超人說」為代表論述，也是人類克服虛無主義的出路。「超人」標舉「自我完成的意志」，說明人類的生存目標，應定位於不斷超越自己。透過創造一個強而有力的人類典型，尼采跨越傳統以病弱

一種道德層面的批判，揭露都市文明造成宗教約束力的解除，以及人性的不斷沉淪。⁹如〈都市之死〉：

禮拜日 人們經過六天逃亡回來
心靈之屋 經牧師打掃過後
次日 又去聞女人肌膚上的玫瑰香
去看銀行窗口蹲著七個太陽¹⁰

源出於這首詩一開始對於都市之牆「快要高過上帝的天國」的焦慮，羅門在此強化了都市的頹廢生態。「女人」與「銀行」因為都會人日復一日的抵臨，幾乎撐起都市這個飽脹的慾望體。羅門演示了一種「重複」、「厭煩」的都會時間觀，深化都市人在「性慾」與「物慾」間的徘徊沉淪，傳統意義上的「神」在這裡不僅失去對人性的約束力，其崇高性更讓位給繼起的、飽含現代性意味的「慾望」之神。順此而下，羅門接著說：

都市 掛在你頸項間終日喧叫的十字街
那神是不信神的 那神較海還不安
教堂的尖頂 吸進滿天寧靜的藍
卻注射不入你玫瑰色的血管¹¹

這裡顯然更明確揭露「神」的宗教性意涵被剝離與抽空，「十

者為中心的價值體系，創生出「力的意志」。不同於基督教將希望寄託死後世界，尼采認為當人類一切由「力量」產生，便能於現世生命自立，與無意義、無價值的虛無現況持續戰鬥。

⁹ 陳大為：〈羅門都市文本的「雄渾」氣象〉，《國文天地》，第13卷第3期（1997年8月），頁74。

¹⁰ 羅門：〈都市之死〉，《羅門創作大系卷二·都市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61。

¹¹ 羅門：〈都市之死〉，《羅門創作大系卷二·都市詩》，頁62。

字街」儼然成為新的都會信仰，重新填入隨慾望而起的不安與躁動。按《聖經》經文的啟示，十字架含帶受難意義：「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上帝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以賽亞書》53）《聖經》強調了耶穌的受難精神，同時昭顯了救贖的可能。回到羅門這首詩看來，十字「受難」、「無我」、「除罪」的內質，隨都市文明的勃興已被抽換為無限膨脹的「私己」慾望，救贖的可能被隔絕在「玫瑰色的血管」之外。羅門揭露了 1950、1960 年代臺灣都市人的困境，在宗教與都市文明的角力上，羅門詩的宗教「神」幾乎處於節節敗退之勢。

從羅門的嘗試看來，上帝與都市文明兩者此消彼長的對峙關係甚為顯著，而在神敗退之後所遺留下來的，便是充滿罪惡與魔鬼的都市空間。¹²〈都市之死〉展演了一種宗教與都市同時入詩的可能，開拓了都市詩表現手法的腹地。細究而言，宗教與文明的互動關係，恐怕不只建立於歷史進化觀點上的自然消長。就文學層面看來，都市做為文明的其中一種顯著形式，都市詩或許就是觀察宗教與文明問題的一個有效視角。再者，宗教元素在都市詩的現身，或許也說明兩者間具有相互隱喻的通性。按《聖經》看來，亞當與夏娃初時

¹² 陳大為在梳理 1950、1960 年代都市詩發展概況時，便認為羅門的都市書寫，緊承痲弦、余光中對於都市文明「罪惡化／魔鬼化」的書寫模式。詳參陳大為：〈對峙與消融：臺灣都市詩的發展歷程〉，《20 世紀臺灣文學專題 II：創作類型與主題》，頁 85。1950、1960 年代都市詩相似的母題，卻有不同的表現手法，羅門則特別擅於將宗教元素入詩，透過對比來強化都市文明的罪惡與黑暗。

的「墮落」，來源於惡魔的誘惑：「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雅各書》1：12-15），亞當夏娃受到誘惑墮為凡人，實際上是更根源地出於一己之「私慾」。「慾望」同為構成現代文明的基質，當人們沉淪於「物慾」與「性慾」膨脹的現代城市，罪惡便由此而生。是以，「慾望」做為「惡」的共同源頭，誘導著信仰的出軌，亞當與夏娃的墮落幾乎成為現代都市人的原型，宗教因而能夠做為都市文明牢靠的隱喻基礎。

在這層關係上，羅門只是一個先導，待及 1980 年代孫維民才更加自覺地運用基督教元素，探索宗教與文明的拉鋸張力。1980 年代臺灣文學環境漸由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發展，文學與城市的關係也產生變化，洛楓就曾考察後現代、詩與城市的關係：

緊接現代主義而來的後現代主義，與城市的關係更密切，思考或背叛城市的方式更層出不窮。……詹明信也說「後現代主義不是要改造城市，而是生活在城市裡，這是一個消費社會的城市」。¹³

無論從洛楓或是詹明信的觀點看來，後現代主義下文學與城市的關係，已與現代主義時期有所不同。詹明信曾指出，後現代主義最初發生的領域即在「建築」。不同於現代主義建築，相信規律而拒絕裝飾與多餘物，從而接近一種「烏托邦式」的「空間治療」。後現代主義追求的是大眾化、愉悅和美，亦即洛楓所引：一個充滿「消費」性的城市空間。詹明信這樣解釋後現代思維變化的根據：

到了後現代主義階段，文化已經完全大眾化了，高雅文化或

¹³ 洛楓：〈從後現代主義看詩與城市的關係〉，《當代》，第 62 期（1991 年 6 月），頁 55。

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距離逐漸消失。商品進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成了商品，當然這並不是說那些理論家用自己的理論來發財，而是說商品化的邏輯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思維。總之，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消費品。¹⁴

「商品化的邏輯」儼然使「物」成為後現代社會的新宗教。因而相對於現代主義立意「改造」，後現代主義更像是純粹「提供」或者滿足適合大眾口味的素材。落實到都市詩的書寫來說，人與城市的關係則有更趨密切的傾向。¹⁵

陳克華與林耀德做為此時期都市詩人的代表與關鍵轉換點，各自從內容、形式、手法等層面，開展對於後現代都市空間的想像以及「詩」的可能。陳、林二人的嘗試，使後現代都市空間的面貌賦形成為新的「科幻」城邦，飽含詩人高漲的「末日」意識。¹⁶ 孫維民早期的詩作看來，也不乏較為悲觀的書寫題旨：

¹⁴ 詹明信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臺北：允晨文化，2001年），頁174。

¹⁵ 陳大為也認為，同樣受到後現代主義詩潮洗禮的陳克華、林群盛，都有將都市建築軀體化或臟器化的書寫模式。詳參陳大為：〈對峙與消融：臺灣都市詩的發展歷程〉，《20世紀臺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頁105-106。

¹⁶ 陳大為：〈對峙與消融：臺灣都市詩的發展歷程〉，《20世紀臺灣文學專題II：創作類型與主題》，頁95-109。詹明信也曾略為提及後現代主義與科幻小說的關係，認為相比於「機器人」，科幻小說裡的「仿生人」，幾乎與人類無所差別。這種「類像」，使得人類的真實感反而被抽空，造成現實感的喪失。形象的複製，正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的重要徵象。詹明信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頁234。

禿鷹飛過神殿的斷柱
在空洞的肋骨間
蜘蛛不停地穿梭
死亡 美麗的陷阱
獅子走過沾血的石階
沒有人會來救你
你只是一個人 永遠¹⁷

在孫維民看來，其所處的城市空間無一處不充滿死亡與腐敗的末日氣息。孫維民透過「你」在城市空間的徘徊遊走，描勒一幅宛如艾略特的荒原圖景，在這座黑冷的城市荒原裡，舉目所見都是荒涼頹敗的「殘景」，以及主體游動其間的廣大孤絕感和對死亡的焦慮。透過「神殿的斷柱」、「沒有人會來救你」，孫維民在這裡似乎暗示了救贖的不可能，這就不只是昭顯信仰在城市中的殞落，更隱喻文明一代價值的失落現象。¹⁸

將古典神話的發源空間與現代文明城市空間相互為喻，顯出文明世代信仰失落的絕望感，是《拜波之塔》中常見的手法。如〈雨季〉首先描述窗外的城市雨景，隨著視線移動，看見雨落在都市的

¹⁷ 孫維民：〈城市1：叢林〉，《拜波之塔》（臺北：現代詩季刊社，1991年），頁143。

¹⁸ 這種文明帶來價值失落的隱喻軌跡，其實在孫維民另一首組詩〈城市2：輓歌〉中，有更清楚的展示：「到處都是聲音／但是沒有旋律／到處都是文字／但是沒有意義／到處都是方向／但是沒有目的」。講求「碎片化」、「去中心／經典」、「混雜」的後現代，孫維民這首詩顯然準確地觸及1980年代的這種「多元」特性，但若從反面立論，「多元」的時代也宣告著價值信仰的失落。孫維民：〈城市2：輓歌〉，《拜波之塔》（臺北：現代詩季刊社，1991年），頁146。

「陽臺與屋簷」、「磨損的門階」以及「扭曲的小路」，當屬眼下的都市視域。稍後，詩人視線隨即進入超現實幻境中的「墓場」、「生蛆的白骨」以及山裡的「鳥巢與蛇窟」，深化森冷恐怖之感。¹⁹ 透過兩點的串連，這場城市雨季最終淋濕在希臘神話中的雅典城邦：

雨落在雅典的大街
在荒蕪的蘋果園
在放逐的小島，雨落
在未來的廢墟，殘破的
城牆，傾圮的石柱²⁰

雅典做為古希臘城邦，輝煌的神話時代在孫維民看來顯然早已失落。透過「雨季」，現代「都市」和古典「城邦」產生時空對應，前者象徵城市文明，後者則為往昔宗教文明的隱喻。「果園」做為神話的配套意象，在詩中顯然也並不牢靠，上帝的果園再也回不去，終將成為「未來的廢墟」中的一景，反襯詩人對所處都市空間的絕望感受。針對信仰在後現代都市空間中的殞落，羅門曾有精闢的分析：

當一座座禮拜堂，在後現代快速發展的文明都市中，繁忙得如同牧師替上帝為眾人清洗靈魂的「大同洗衣機」……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腳下踩的都是自己走往「天堂」與「天國」的路。²¹

羅門的論述精準地闡釋在多元的 1980 年代，中心價值信仰崩

¹⁹ 孫維民：〈雨季〉，《拜波之塔》（臺北：現代詩季刊社，1991年），頁 79-81。

²⁰ 孫維民：〈雨季〉，《拜波之塔》，頁 81-82。

²¹ 羅門：〈「詩眼」看後現代都市生存場景〉，《創世紀詩雜誌》，第 162 期（2010年3月），頁 64。

落的現象，不再有貴為一尊的「上帝」與神。孫維民的早期詩作，充分演繹這種信仰失落的現象，承接著羅門將宗教元素入詩的手法，並結合 1980 年代陳克華以來「末日」都會的思想路徑，開創其獨特的都市空間與關懷。

到了後兩本詩集《異形》與《麒麟》，都市更頻繁地做為孫維民詩的基本背景，並透過諸多瑣細化的日常書寫，揭露「惡」的種種面目。劉正忠認為，污鬼一般的生命體驗，是孫維民詩一貫的筆調，而從《異形》與《麒麟》開始，大致呈現了魔怪意象漸強的書寫模式的轉變。²²此一模式的轉變，在本文的關注焦點而言，或有兩重意義，一來魔怪意象的增強與細節化，使整個都市（甚至是整首詩本身）就像一塊藏污納垢的海綿，不停吸納「文明」各種不潔的細菌。「瑣碎化」的書寫風格轉變，演示後現代都市以「進入日常」為「商品化」的途徑。如〈宴〉藉由鋪排和羅列，設計詩行空間：

杯盤還殘餘著字句和笑臉的渣滓

地板上的骨頭髮白、花瓣變黑

桌椅斜躺在自己的虛空裡

因為血的腥臊而無法入睡

最後，文明如屎留下²³

相較於前行詩集對於文明較為隱晦的批判，孫維民這裡將文明的形式更加具體落實於都會人的宴會儀式。細微的視角遍及於宴會中的「杯盤」、「笑臉」、「骨頭」、「花瓣」、「桌椅」，卻象

²² 這種轉變是漸進式的，在《拜波之塔》中雖多可見明亮的果園意象，但多不純粹，往往暗示了衰頹委頓的終局。詳劉正忠：〈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臺大文史哲學報》，頁 156。

²³ 孫維民：〈宴〉，《麒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 年），頁 27。

徵著污穢文明的一切形式。瑣細化的視角書寫，使「魔怪意象」顯得更加無所不在。又，都市空間做為文明的基本背景，魔怪便藏匿於日常生活中，不再只是停留於前述詩中抽象的超現實幻境或宗教概念。

其次，在基督信仰與文明的角力而言，魔怪意象的增強表面上雖使「神」處於劣敗之勢，但「神」做為一種仰望的依據，在孫維民詩中始終並未因此為文明之「惡」所吞噬。是以，這兩本詩集開始，宗教信仰與都市文明的拉鋸在某些詩中反而更為強烈，並表現在主體如何經歷「善——惡」、「神——魔」、「救贖——絕望」、「信仰——文明」等一連串概念掙扎的過程。如〈異形〉：

我在信封上書寫姓名地址
 我拿起電話按下一堆數字
 我走進黑暗的街道直到破曉
 我駕著車任憑儀錶求救尖叫
 我打開門找到床枕
 躺下以前照例我
 祈禱²⁴

詩中的場景依舊發生在都市空間，而「我」則在善惡交互傾軋的狀況下，演示了一套「排出」的程序。從結果看來，誠如痙弦所說，面對這個闖入身體的寄居物，詩中的「我」無論用什麼「排出」方法，顯然最終都須面臨失敗頹唐的局面。²⁵但在失敗的終局之前，「我」卻展示了一連串不間斷的「動作」與宗教儀式，企圖逃脫「惡」的威迫，並渴望由此獲得靈魂的淨化與救贖。縱使最終「禱告不得

²⁴ 孫維民：〈異形〉，《異形》（臺北：書林出版，1997年），頁68。

²⁵ 痙弦：〈小評〉，收入孫維民：《異形》，頁70。

透入」，卻已經把善惡、宗教與都市文明、救贖與絕望間的拉鋸感呈現出來。實際上，侵入靈魂的「異形」只是其中一種「惡」的籠統概念，我們無法從詩中找到此一對象的具體指涉。是以，這首詩雖以都市為背景，卻很難說都市文明就是與信仰發生衝突的對象。又，與其說這種善惡的衝突與拉鋸是發生在都市空間，從這首詩看來毋寧更像是發源於主體內部，都市場景的書寫只是「我」的內在鏡像投射或自我衝突的戲劇化呈現。

孫維民曾認為，神魔的主要戰場一直就是「人」。²⁶ 彌爾頓《失樂園》中，撒旦被神打入地獄後密謀反叛，最終決定以亞當夏娃為誘惑對象，造成人類始祖從伊甸園墮落。正因人做為上帝之子，撒旦認為只要擊垮人類，就是戰勝神。循此一信仰認知模式，孫維民詩中的都市書寫或許就無法純粹只看做是一般狀寫文明罪惡的都市詩，而與詩人內在心境有某種程度的映顯關係。是以，當善惡衝突外顯為神魔交爭的都市空間樣態，便宛如一幅當代的失樂園圖景，成為孫維民詩中慣常出現的都會樣貌。如〈兒語〉：

這個世界多麼陌生啊！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彷彿一群翅膀斷落的
 有罪的天使 環伺在我四周²⁷

詩一起頭就是失樂園的隱喻，背叛上帝的墮落天使，被逐出伊甸園後與撒旦「環伺」成為一股「惡」力，預備與「神」抗爭。孫維民對於現世雖發出一種近於絕望的呼求，但後方卻以斬截的語氣

²⁶ 孫維民：〈人是神魔的戰場〉，《所羅門與百合花》（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217。

²⁷ 孫維民：〈兒語〉，《異形》，頁38。

宣告「我要回家」，回到「我曾經伸展透明的羽翼／在燦爛芬芳的果園裡飛翔」的伊甸園，²⁸ 透露其信仰的堅定，也顯出神與魔在都市空間中未曾稍歇的抗衡狀態。這種書寫模式在〈公車〉一詩，有更顯著的軌跡。透過公車在城市空間的繞行，「我」的視線經過了巷口「肥胖流汁的腐臭垃圾袋」、丟棄的「電瓶與奶嘴」，「蟲蠅」則貪戀於這些文明富饒的產物，面對這些散落在都市角落的「惡」，孫維民並未放棄禱告：

照例，我閉目自語：

「求你睡醒，為何儘睡？

救我們脫離野狗之處

願你拾起槍和盾牌

而他們如風前的糠——²⁹

禱詞直接入詩在孫維民詩中多有所見。「照例」說明動作的「重複」，「重複」則進一步揭示想望始終「未完成」的狀態。縱使經歷角落各處的腐敗不堪，孫維民始終並未放棄對於上帝的呼求與召喚，使「惡」在孫維民詩裡，就不僅只是獨大專權的力量。神聖意象與污穢意象的並置，³⁰ 也顯出在罪惡現世中掙扎的過程。

是以，無論是羅門以來宗教與文明的詩學議題，或是陳克華、林耀德對於都市詩的開拓，孫維民似乎選擇了一種更加折衷的方式寫詩。在其詩而言，固然存在諸多文明的罪惡形式，使其在美善的追求過程中，往往落入一種絕望無依的境地，但宗教元素的大量入詩，

²⁸ 孫維民：〈兒語〉，《異形》，頁 39。

²⁹ 孫維民：〈公車〉，《麒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 年），頁 132。

³⁰ 陳政彥：〈冷冽的都市形上學：孫維民小論〉，《創世紀詩雜誌》，第 162 期（2010 年 3 月），頁 15。

卻深化了善與惡、救贖與絕望之間的辯證性，其筆下的都市空間因而宛如失樂園神魔交戰的狀態，神與魔同在經歷勝敗的種種可能。

三、樂園的尋返？「我」的安頓問題

前述提及，孫維民詩的都市空間往往呈現一種神魔、善惡相互抗衡的狀態，雖然都市文明不斷發展，罪惡的形式更趨細微險惡，但孫維民詩中的神始終並未隨這些黑冷意象沉淪。在這層意義上，信仰是否就是孫維民在都市空間中安放自我的方式？宗教信仰是否仍有超越的力量？孫維民於2016年出版《地表上》，相較前行詩集，《地表上》的內容意象、語氣氛圍都顯得更加輕快開朗，孫維民是否在信仰與文明、自我與世界的衝突間找到了調和方式？本節重點探討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如何體現二十一世紀後都市空間的轉變軌跡，孫維民又如何調和前行詩集中的種種衝突，在都市空間找到安放自我的方式，進而促成這種風格上的轉變。

早於《拜波之塔》，孫維民詩就可見對於「自我」的探問，當中的問題首先表現在對於窗意象的使用。「窗」意象的使用，在東西古今文學傳統中甚為常見。在英詩傳統中，「窗」自十九世紀，漸與個體內在世界產生密切聯繫，往往伴隨觀望者、偷窺者的現身。浪漫主義時期，窗意象與大自然的連接，在工業時代轉而成為狹隘疏離的象徵意義，最後更轉變為主體超越的投射，透過主體超越的凝視（Transcendental Gaze），明窗成為可實現理想的另一世界，有時甚至成為理想化的戀人。³¹陳大為亦曾注意到羅門都市詩中的「方

³¹ 任立華：〈中國古典詩與英國浪漫詩中之窗意象〉，收入《第三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7年），頁168。

形」意象，認為羅門建構了一個多重方形的都市空間，且凸顯出都市人封閉、黏滯的處境。³²是以，窗與主體內在相互為喻的關係，已為詩人多所運用。孫維民做為外文系學院背景的現代詩人，在其詩中亦多可見這層隱喻關係。如〈春〉：

我的小屋只有一扇窗
面向一堵濕冷的牆
窗外恆是斷續的兩點
點點滴滴，低不完的
哀傷。沒有山，沒有樹
看不見日落
看不見日出

你說無妨無妨：
「我將為你開啓
另外一扇，要有光——」說著
燦爛的金陽照在一棵
顫抖的花樹上，鮮黃和嫩綠
想必是春臨的消息³³

上述二段的「窗景」顯然相互顯出一種鮮明的對比關係。合而觀之，首段與其說是寫實性的都市窗景描勒，毋寧更像是觀者內心風景的映現，有窗卻「看不見」的對比性，揭示出城市之窗的視線遮蔽感，凝聚出「窗景」失落的憂傷氛圍。次段靈動明亮的超現實想像，做為一種「超越的凝視」，在首段的對比之下，明顯透露出

³² 陳大為：〈黏滯的方形：羅門都市詩中的生存空間〉，《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 6 期（1997 年 6 月），頁 310。

³³ 孫維民：〈春〉，《拜波之塔》，頁 15-16。

觀者的理想寄託。在孫維民看來，現世之窗固然一如往常地潮濕絕望，但顯然他相信上帝仍將開啟另一扇窗，安慰宛如不透光窗景的絕望心靈。孫維民對於聖經經文的直接引用，來自篤定武斷的語氣與章節，強調上帝對人的「允諾」性，似也企圖藉此強化個人對於上帝、信仰的信心，而這樣的信心正是抵禦現世絕望的力量與可能。

其次，透過孫維民詩中「我」對於「上帝」的認知，也是觀察孫維民「自我」觀的路徑。前述提及，孫維民詩常以基督教元素入詩，整體看來，彷彿其詩往往在與聖經對話，透過這種對話過程，書寫其對於現世、信仰與自我的認知。如〈果園〉更直接以聖經意象為題：

我時常走進那條曲折的小徑，追隨著
 斷續的花香，搖曳的蔭影，與你
 走進一片我們熟悉的果園——讓我們
 走進一棵豐美的蘋果樹，依附著
 重疊的黑暗，靜靜地取暖³⁴

表面上看來，孫維民似乎頌揚了果園的美好並宣告自身對於上帝伊甸園的嚮往。是以，舉凡「花香」、「樹影」、豐美的「果園」，都彷彿是一簇簇堅定的火源，使人得以在異質的黑暗中感到熟悉溫暖。值得注意的是，孫維民此詩固然透露了對於上帝穩固的盼望，但這些看似明亮的果園意象，卻是隱匿於「曲折的小徑」，且依附在「重疊的黑暗」中，果園的花香似也因此顯得「斷續」稀疏。正如陳政彥曾言孫維民善於將「神聖意象」與「污穢意象」並置入詩，³⁵

³⁴ 孫維民：〈果園〉，《拜波之塔》，頁 72。

³⁵ 陳政彥：〈冷冽的都市形上學：孫維民小論〉，《創世紀詩雜誌》，頁 15。

這種雙重性在孫維民詩中甚為常見，也顯出孫維民自我觀的矛盾張力。既是認知到「信仰」依附「惡」與「黑暗」而生，一方面側映出人性之「惡」的本質性存在，另一方面似也對神多了疑惑與不確定性，拋出信仰之光是否真能擊退惡之黑暗的內在叩問。

對於自身信仰的不確定感，在其他詩作中，也不乏類似書寫。或許，孫維民擅於並置二元意象書寫模式，反而消除了「善—惡」、「神—魔」、「救贖—絕望」等概念間的簡單分立與化約，並強化了二元概念間的辯證性。誠如前述所言，這種二元概念間的僵持狀態，使雙方隨時都在經歷勝敗的可能，反而顯出兩者間變動的消長關係，也充分顯映自我的內在矛盾性。〈人們〉便透過生老病死四階段歷程，狀寫人性之複雜面向。如寫孩童時首先提及神依據了他的形象創造天使，說明孩童的天真顫動的生命力，其後卻認為「發光的臉龐多像樹上悅目的果實／令人不禁想要採摘，和咬噬」，³⁶在一連串神啟意象之後，孫維民最終埋伏了「咬噬」的可能，揭露即是孩童亦無法外於「惡」的本質性存在。又如描寫面對病體的鄰居：

他應當謹守生命
不是咒詛，是為敵人祝福，
可是他真希望毒菌繁衍
在她迅速潰爛的內臟。³⁷

神告訴世人應當「謹守生命」、愛護同胞，詩中的兩個主體卻相互憎恨，最終面臨兩敗俱傷的局面。疾病做為一種「惡」的隱喻，這裡同樣是透過並置性的書寫，強化善惡的拉鋸張力。在基督教教

³⁶ 孫維民：〈人們〉，《異形》，頁 117-118。

³⁷ 孫維民：〈人們〉，《異形》，頁 119。

義裡的「惡」，似乎往往動搖著孫維民對於神的信念。孫維民早期詩作尚如〈公車〉、〈地震〉等，都描勒了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詩中彷彿存在一個不安的主體，時時在善惡的邊緣感到困惑，卻始終仍盼望一點純善的可能。

仰望又困惑的心理狀態，直到孫維民最新詩集《地表上》，仍可見腳蹤。如〈給月亮的情歌〉：「眾多的救護車過而不停／似乎神也冷漠以對，無感於／一名倒臥在生活中的傷者」，³⁸ 承續前行詩集的書寫模式，孫維民的關懷視角仍落於都市空間，狀寫連神都棄而不顧的都會生態。都市冷漠疏離的情態，迫使孫維民再度發出了對於上帝存在與否的質問，語氣絕望而憂傷。³⁹ 細究而言，《地表上》的都市型態已與前行詩集有所不同，更加往「數位都市」發展，因而無論是神魔、善惡或自我定位的形式與內涵，都隨之有所變動。

二十世紀 1990 年代後期，進入網路世代，數位化的內容及思維模式，成為重要主題，上個世代的都市意識更加內化為詩人的書

³⁸ 孫維民：〈給月亮的情歌〉，《地表上》（臺北：聯合文學，2016年），頁 112。

³⁹ 孫維民對於信仰的困惑與叩問，有過多種表現方式，不只有絕望憂傷或不安主體的現身。如透過戲謔性的筆法，將聖經經文改寫入詩：「心好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肝好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腎好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胃好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對於生病的厭煩感融入經文，營造一種反諷的效果。參孫維民：〈人們〉，《異形》，頁 120。以戲謔筆法書寫內心對於信仰的困惑，尚如對於禱詞的遊戲化：「（主啊，我時常這樣祈求）／以更多新的軟體／將我升級。」將網路用語融入禱詞，透過一種對於宗教神聖性的顛覆，提出自我對於神的困惑。參孫維民：〈假日的四行詩〉，《地表上》，頁 111。

寫背景。⁴⁰ 孫維民《地表上》演示著這種都市空間的轉移，同樣書寫文明帶來的生存病痛，文明的內質已有所抽換，如〈通車時的消遣〉：

不顧夜之迅猛的中產階級
開啟筆電。他點擊一則新聞
（阿布達比的首都之門）
隨即留言：「所謂的文明
究竟是什麼東東！
？大大說一下。」⁴¹

詩中的「中產階級」看似做為「文明」的批判者，實際上是孫維民的反諷對象，「不顧夜之迅猛」更說明了現代人對於網路的依戀。短短的詩行只含藏了「開啟筆電」、「點擊」、「留言」的動作，文明的面目不再散落於實體都市的各個角落，需要透過公車或主體視線的移動才能完成串連，在這些俐落快速的動作間，文明的新形式就已昭然若揭。在〈給賈伯斯〉中，更可以發現網路世代的來臨，不僅昭告著新文明與新宗教的誕生，也改變了孫維民詩向來的善惡結構：

如果我走得夠遠
我將可以離開這些低垂如病痛的頭
面向機器虔誠默禱的，這些
新興宗教的善男信女——
我將可以離開他們的神（雖然

⁴⁰ 陳大為：〈對峙與消融：臺灣都市詩的發展歷程〉，《20 世紀臺灣文學專題 II：創作類型與主題》，頁 110-111。

⁴¹ 孫維民：〈通車時的消遣〉，《地表上》，頁 39。

祂的回應通常易懂而快速) 以及
祂所散發的利齒狀的電磁波
如果走得夠遠⁴²

詩中可見，孫維民仍透過「低垂的頭」、「虔誠默禱」、「善男信女」，反諷了人在虛擬空間的迷失與依賴。數位都市興起後，神的形象並非隨個人主義而起的「自我」，更觸及不到傳統宗教的抽象意義，反而是對於資訊「無所不應」的網際網路，擔待了神的功能與職務。

隨著都市空間導向虛擬化，人與人的鍵結建立於網路空間，實體距離的相對擴大，使人性面向在虛擬網路中，更加隱微不可見。是以，善惡、神魔、絕望與救贖間的界線，似乎也因此更難以捉摸。「惡」的可能，也因網路對於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侵入，更加隱匿於日常細節。在這兩重轉變上，一來使《地表上》的整體書寫更加貼近於日常生活，二來前行詩集中善惡抗衡的狀態，在這裡似乎因此得到了一種平衡狀態。表現於詩語言，則使《地表上》整體看來，一掃過往污穢不潔的異質體驗與冷肅的語言風格，轉而營造出更加親切近人的氛圍。

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的風格轉向，我們仍要問，孫維民詩中那個不安的主體，在都市文明或虛擬網路中找到了安處自我的地方了嗎？語言風格的轉變，是否真的可以做為孫維民在善惡、信仰與現世、神與自我之間，找到平衡或超脫的有效憑據？或許，正如孫維民在《地表上》的〈後記〉中，為此詩集所做的書寫定位：

這裡的詩顯然不是答案。對於人和苦難，我還有太多的不滿和迷惑，我也只能夠以文學形式記錄那些迷惑不滿。……做

⁴² 孫維民：〈給賈伯斯〉，《地表上》，頁 50-51。

為所謂的有情，我至今也全然無法免於外境干擾。詩集題為《地表上》，無非也因為有這種體悟。⁴³

孫維民上述之言，恰體現了從《拜波之塔》以來其詩可見的矛盾性。既不滿於生存的苦難，而時常劃出「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邊線，或透過善惡境的對比書寫，傳達內心強烈的出走渴望。但做為「有情」人，孫維民也體認「惡」之內在於「我」，有其本質上的不可超越性。是以，詩中的矛盾自我可能終究仍須處於困惑徘徊的游移狀態，試圖探索平衡的可能，很難真正從中尋得安身落腳處的所在。正是在這種尋覓的過程中，我們對於孫維民詩風格轉變的理解，或許可以說他尚在尋返的路徑上，尋找「自我」與「世界」可能的平衡方式。誠如〈關於散步〉：「回到這一塊地表／所以，其上只有雜草／土石、蟲、鳥，缺乏價值的／光線、微風、露水／沒有腐敗的聲音阻擋／沒有所謂的人性／當你開始行走／當你真正地開始」，⁴⁴ 孫維民《地表上》嘗試沿著地表行走，會晤地表上的自然萬物，展開一種「缺乏價值」、沒有企圖的溝通。或許很難確切地說他是否真的找到了一種具體方法或成效，達到心靈的平衡狀態，「土石」、「蟲鳥」、「微風露水」又是否有其他隱喻的物件，但或許可以確定的是，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透露了孫維民「自我」平衡的探索軌跡。就這層意義而言，或許他正是在樂園回返的路徑上，不斷經歷尋找答案的過程。

⁴³ 孫維民：〈後記〉，《地表上》，頁 196。

⁴⁴ 孫維民：〈關於散步〉，《地表上》，頁 128-129。

四、結語

宗教與文明辯證的相關書寫，從羅門開始即多有嘗試，顯出兩者間有相互隱喻的基礎。到了孫維民更加操作兩者的拉鋸張力，並往往透過古典神話的發源空間與城市空間相互為喻，凸顯文明世代信仰失落的絕望處境。從《異形》開始，孫維民詩中的魔怪意象漸強且書寫視角更趨瑣細化，並帶來都市空間的兩重轉變。一來都市空間不停吸納各種文明的細菌，呈現一種藏污納垢的都市型態。二來加以宗教元素的大量入詩，都市空間中文明與信仰間的角力增強，深化了善惡、救贖與絕望、神魔等概念間的張力，而不只全然為「惡」所佔據。孫維民都市空間做為善惡共存、交爭的場域，實際上亦是「自我」內在衝突的鏡像化與戲劇化。其詩對於「自我」的探問，可從其詩中的「窗意象」、「對於上帝的認知」以及「對於信仰偶爾的不確定性」三方面見出。其詩往往存在一個不安的主體，時時困惑於善惡、仰望與絕望之間，卻始終仍盼望純善的可能，呈現自我的矛盾形象。

《地表上》開始的書寫題材，顯示實體空間轉移至數位化虛擬空間的發展軌跡。網際網路成為新的文明形式，孫維民詩中善惡的結構與內涵皆有所轉變。空間的虛擬化，使善惡、神魔間的界線因此更難以捉摸。一方面使《地表上》的書寫更加貼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則似乎削弱了前行詩集中善惡抗衡的狀態，使《地表上》的語言風格轉向更加親切近人的書寫氛圍。從《拜波之塔》到《地表上》，孫維民詩始終呈現一種自我矛盾性，既不滿於生存的苦難，又深切體認「惡」內在於人，有其不可超越性，故其詩中的「自我」，可能始終是處於一種游移狀態。但或許可以說，風格的轉變透露了孫維民對於「自我」與「世界」平衡的探索與嘗試，在樂園回返的路徑上，不斷經歷尋找的過程。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任立華：〈中國古典詩與英國浪漫詩中之窗意象〉，收入《第三屆中國文哲之當代詮釋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5 年。
2. 孫維民：《拜波之塔》，臺北：現代詩季刊社，1991 年。
3. 孫維民：《異形》，臺北：書林出版，1997 年。
4. 孫維民：《所羅門與百合花》，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
5. 孫維民：《麒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 年。
6. 孫維民：《地表上》，臺北：聯合文學，2016 年。
7. 陳大為、鍾怡雯編：《20 世紀臺灣文學專題 II：創作類型與主題》，臺北：萬卷樓圖書，2006 年。
8. 詹明信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臺北：允晨文化，2001 年。
9. 羅門：《羅門創作大系卷二·都市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

二、期刊論文

1. 洛楓：〈從後現代主義看詩與城市的關係〉，《當代》，第 62 期，1991 年 6 月，頁 54-71。
2. 陳大為：〈黏滯的方形：羅門都市詩中的生存空間〉，《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 6 期，1997 年 6 月，頁 295-310。

3. 陳大為：〈羅門都市文本的「雄渾」氣象〉，《國文天地》，第13卷第3期，1997年8月，頁70-79。
4. 陳政彥：〈惡的象徵：孫維民詩研究〉，《臺灣詩學學刊》，第18號，2011年12月，頁31-52。
5. 陳政彥：〈冷冽的都市形上學：孫維民小論〉，《創世紀詩雜誌》，第162期，2010年3月，頁14-17。
6. 劉正忠：〈違犯·錯置·污染：臺灣當代詩的屎尿書寫〉，《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9期，2008年11月，頁149-183。
7. 羅門：〈「詩眼」看後現代都市生存場景〉，《創世紀詩雜誌》，第162期，2010年3月，頁62-64。

三、學位論文

1. 黃家展：《孫維民詩的主題》，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